



中欧关系研究简报

第十一期

2013年12月28日

清华大学中欧关系研究中心主办

主编：张利华

编辑：王 亮

目 录

【中心快讯】

- 《中国与欧盟关系研究》课程开讲……………师文涛（2）
- 中欧关系研究中心负责人调整……………（3）

【研究成果】

- 欧美建立“跨大西洋贸易及投资伙伴关系”的由来、目标及其影响… 崔洪建（4）
- 英国保守党何以老而不衰？……………史志钦（14）
- 中国传统价值观与民族认同……………张利华（20）
- 陈新做客强国网 聚焦李克强出访中东欧……………（25）

【学术园地】

- 第二届清华—格罗宁根学术研讨会成功举办… 【希腊】Vasilis Trigkas（35）

[中心快讯]

《中国与欧盟关系研究》课程开讲

师文涛

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硕士研究生

金秋十月，应“清华—格罗宁根中欧关系研究中心”之邀，来自荷兰格罗宁根大学的两位老师讲授的国际关系专业研究生专业课程——《中国与欧盟关系研究》于10月22日至11月1日明斋335开课。

2011年9月，清华大学与荷兰格罗宁根大学签订“清华—格罗宁根中欧关系研究合作项目”意向书，规定了双方互派教师讲课，交换学生，举办学术研讨会，出版文集，开展合作研究等。2011年10月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邀请格罗宁根大学国际关系与国际组织学系两位教师开设了《中国与欧盟关系研究》研究生专业课。

今年是《中国与欧盟关系研究》课程第三次在清华大学开课，本次课程采取小班讨论的教学模式，来自中、法、德、俄等国的同学们共聚一堂畅所欲言。清华大学中欧关系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张利华教授致欢迎词并简要介绍了两位主讲老师——荷兰格罗宁根大学的Jan Van der Harst教授和Frank Gaenssmantel博士。两位老师均获得欧洲知名大学博士学位，拥有丰富的教学和科研经验。Harst教授于1996年获得欧盟“让·莫内教授”称号，现担任“清华大学中欧关系研究中心”和“复旦—格罗宁根荷兰研究中心”学术主任。

自10月22日起的两周时间内，本课程共讲授六次计16学时，主讲教师提供了9篇学术文献供选课学生进行课前阅读。该课程采用格罗宁根大学授课模式——课前大量阅读，全程英文讲授，教师讲授和课堂讨论相结合。在授课过程中，同学们如有不解和疑惑，可以随时进行发问；课上安排了较多的讨论时间。

该课程第一周由Jan Van der Harst教授讲授关于欧盟的内容，包括欧盟的历史、金融危机对欧盟的影响、里斯本条约、欧盟的扩大等题目；第二周的课程由Gaenssmantel博士讲授欧盟与中国的关系问题，包括贸易、武器禁运、市场经济地位等。两位老师用严谨的态

度、渊博的学识和幽默的语言吸引了所有学生的注意力，同学们认真听课积极发言，不时发出会心的笑声和阵阵掌声。课堂上学习兴趣非常浓厚、课堂氛围特别活跃。对于中国学生而言，该课程使人感觉耳目一新。全英文授课对于英语的听说能力也是一种锻炼和提高。

中国与欧盟关系是当今中国外交非常重要的一环，受制于师资力量，我系至今没有开设这方面的课程。中欧关系研究中心邀请荷兰教授开设《中国与欧盟关系研究》课程，对于丰富我系欧洲问题研究，扩展学生的思维视野具有重要的意义。

中欧关系研究中心机构及负责人调整

经院领导决定，2013年12月，中欧关系研究中心理事会和负责人调整如下：

主任：张利华

学术主任：Jan van der Harst（荷兰籍）

理事会主席：郑燕康

副主席：曹雪飞（荷兰籍） 史志钦 杨世茁

[研究成果]

欧美建立“跨大西洋贸易及投资伙伴关系”的由来、目标及其影响

崔洪建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清华大学中欧关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载于《国际问题研究》2013年第5期

[关键词] 自贸谈判 欧美经贸关系 国际经贸格局

[提 要] 为应对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的迅速变化，欧美启动了“雄心勃勃”的“跨大西洋贸易及投资伙伴关系”谈判，这既是近十年来建设“欧美共同市场”构想的延续和升级，又是传统经济体在经济全球化冲击下做出的主动战略协调，有着较为明确的收益预期和提振欧美经济、主导国际经贸变化方向的战略意图。“跨大西洋贸易及投资伙伴关系”的提出、谈判进程及最终结果不仅将对当前国际经贸格局产生强烈的“溢出”效应，而且也将是影响未来中国经贸政策、结构和发展模式的重大复杂外部因素。

由于先后陷入金融、经济和债务危机，并面对来自新兴经济体日益增大的竞争压力，欧美正通过激活酝酿已近十年的“跨大西洋共同市场”构想、启动“跨大西洋贸易及投资伙伴关系”，（Transatlantic Trade and Investment Partnership，以下简称 TTIP）来整合双方贸易、投资结构并协调彼此政策，以达到降低经贸成本、刺激增长和维护其在国际经贸格局中主导地位的目的。TTIP 的启动是当前欧美经济形势与国际经贸格局变化相互作用的产物，将对未来国际经贸格局产生深远影响。作为与欧美经贸联系密切并在国际经贸格局中日益占据重要地位的中国来说，也将受到 TTIP 的巨大影响。

一、 从“新跨大西洋市场”到 TTIP

（一） 难产的欧美“新跨大西洋市场”

加强欧美经济联系、构筑欧美共同市场一直是欧美高层磋商的重要话题。在 1995 年欧美马德里峰会达成的“新大西洋议程”（New Transatlantic Agenda, NTA）中，双方首次

提出创立“新跨大西洋市场”（New Transatlantic Marketplace, NTM）以强化欧美“跨大西洋关系”的经济维度，为此要求双方在政府及非政府层面展开磋商，以克服主要贸易障碍并密切经济合作。^① 双方随后于 1997 年签署“互认协议”（Mutual Recognition Agreement），提出建立“可比较性标准”的可能性，并对 6 项产品进行了相关标准测试。^② 1998 年 3 月，在时任欧盟贸易委员布里坦爵士的主导和推动下，欧委会发表题为“新跨大西洋市场”的公报，呼吁在欧美间进行“经济整合”，提出了在 2010 年前在欧美间完全取消工业制成品关税、创建双边服务贸易免税区等具体目标。^③ 但由于当时欧盟反对美国的《赫尔姆斯—伯顿法》和《1996 年伊朗、利比亚制裁法案》，要求将解决双方在上述问题上的分歧作为推进 NTM 的“先决条件”，同时一些欧盟成员国出于各自利益也反对建立 NTM。时任法国总统希拉克就认为建立“欧美共同市场”将损害法国的通讯、农业和“知识创造”产业，并认为欧美双边机制将削弱 WTO 多边机制，而且法国还担忧时任欧盟贸易委员的英国人布里坦“会将美协调置于欧洲内部协调之上”。而荷兰反对的理由则是“NTM 未纳入农产品，不利于推动欧盟共同农业政策改革”。此外德国、比利时等国对 NTM 也不积极。欧委会的勃勃雄心因此受挫，最终双方只是达成了具有象征意义的“跨大西洋经济伙伴关系”。^④ 此后，尽管欧美还曾于 2005 年提出“跨大西洋经济一体化和增长倡议”，并于 2007 年创立以在特定领域实现“监管协调”为首要目标的“跨大西洋经济委员会”，^⑤但欧美在推动经贸政策整合和规则协调方面进展缓慢。

（二）当前欧美经济困境危机催生 TTIP

在先后陷入金融和债务危机后，欧美均面临经济衰退和失业率上升的严峻挑战，迫使其急于寻找到“刺激增长的新路径”。同时，世界贸易组织多哈回合谈判的停顿，也让欧美逐

^① EEAS: *The New Transatlantic Agenda*, http://eeas.europa.eu/us/docs/new_transatlantic_agenda_en.pdf.

^② Claudia Louati and Alexander Whalen: *EU-US trade relations: towards a free trade agreement?* 5 November 2012, <http://www.nouvelle-europe.eu/node/1562>.

^③ *The New Transatlantic Marketplace: Communication from the Commission to the Council,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Committee*, 11 March 1998.

<http://eur-lex.europa.eu/LexUriServ/LexUriServ.do?uri=COM:1998:0125:FIN:EN:PDF>.

^④ *New Transatlantic Marketplace: France Keeps Brittan's Ship at Bay*, International Centre for Trade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Bridges Weekly Trade News Digest* • Volume 2 • Number 16 • 4 May 1998, <http://ictsd.org/i/news/bridgesweekly/92188/>.

^⑤ 在 2007 年 4 月的欧美峰会上，时任美国总统小布什与欧盟理事会轮值主席、德国总理默克尔共同签署“推进跨大西洋经济一体化框架文件”（*Framework for Advancing Transatlantic Economic Integration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the European Union*），同意建立“跨大西洋经济委员会”（Transatlantic Economic Council）以落实 2005 年达成的“倡议”以及“框架文件”。理事会由欧美双方各派出“内阁级官员”出任联合主席，并向欧美峰会负责。首任美方主席为布什总统经济事务助理 Allan Hubbard，欧方主席为欧委会副主席兼产业委员德国人 Günter Verheugen。“框架文件”及委员会情况分别参见美国白宫网站，<http://georgewbush-whitehouse.archives.gov/news/releases/2007/04/20070430-4.html>,

<http://www.state.gov/p/eur/rt/eu/tec/index.htm>.

渐失去推动多边机制的耐心，寻求双边机制以“盘活”欧美经贸和投资资源的需求上升，双方经贸战略的协调步伐明显加速。在 2011 年 11 月的欧美峰会上，双方同意设立由欧盟贸易委员德古特和美国贸易谈判代表罗恩·柯克共同领导的“就业与增长高级别工作组”(HLWG)，其目的是为“强化欧美经济关系并挖掘跨大西洋伙伴关系的全部潜力寻找新路径”，其任务包括评估并消除现存的双边贸易障碍。^①这一举措得到当时德、法、英政府的普遍支持。工作组在 2012 年 6 月发布的“中期报告”中，呼吁欧美双方就一项“具有雄心的”广泛协议进行谈判，以“实现互惠的货物、服务和投资市场开放，应对贸易规则现代化的挑战，并提高（双方）监管制度的协调性”，具体目标是“取消双边贸易中的所有关税并承诺降低双方的规则障碍”，但仍未直接提出进行全面自贸协定谈判的目标。^②而在 2013 年 2 月 11 日该工作组公布的“最终报告”中，就正式提出在欧美间进行谈判并缔结一项“全面协定”的目标，以达到“消除或降低货物关税等传统壁垒”、“消除、降低或防止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和投资中障碍”、“提高（双方）规则和标准的协调性”、“在所有领域消除、降低或防止非关税的‘境内壁垒’（behind the border）”以及“为在共同关心的全球性问题上建立规则和原则加强合作”等目的，并提出涉及“市场准入”、“规则与非关税壁垒”以及“全球贸易规则”三大板块的协定基本结构和内容。^③美国奥巴马总统旋即在于次日发表的《国情咨文》中宣布，“将与欧盟开展全面的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谈判”。^④欧美双方紧接着于 13 日宣布启动各自内部程序以着手 TTIP 谈判。^⑤6 月 14 日，在经过欧盟成员国内部谈判后，欧委会获得与美进行 TTIP 谈判的授权。6 月 17 日，欧美在八国集团厄恩湖峰会期间正式宣布启动谈判，并计划于 2014 年底前完成。从 1995 年的“新跨大西洋市场”到 2013 年的 TTIP，在经历近十年的曲折后，欧美的“跨大西洋经济整合工程”终于“破土动工”了。

二、 TTIP 的预期收益与战略意图

（一） TTIP 的经济和社会预期收益

通过更深程度的经济合作来为双方带来直接的经济和社会收益，是欧美政界最终下决

^① “EU-US Summit: Fact sheet on High-Level Working Group on Jobs and Growth”, http://trade.ec.europa.eu/doclib/docs/2011/november/tradoc_148387.pdf.

^② *Interim Report to Leaders from the Co-Chairs EU-U.S. High Level Working Group on Jobs and Growth*, 19 June 2012. http://trade.ec.europa.eu/doclib/docs/2012/june/tradoc_149557.pdf.

^③ *Final Report High Level Working Group on Jobs and Growth*, 11 February, 2013. http://trade.ec.europa.eu/doclib/docs/2013/february/tradoc_150519.pdf.

^④ Obama: *The 2013 State of Union*, <http://www.whitehouse.gov/state-of-the-union-2013>.

^⑤ *Statement from United States President Barack Obama, European Council President Herman Van Rompuy and European Commission President José Manuel Barroso*. http://europa.eu/rapid/press-release_MEMO-13-94_en.htm.

心启动TTIP的直接动力。欧美官方均将TTIP视作“最划算的买卖”和“千载难逢的机遇”，^①其主要理由也是TTIP诱人的经济和社会效益预期。欧盟官方推广的一项研究报告表明，一旦TTIP谈判成功并得以全面实施，能为双方带来的经济和社会收益指标主要包括：

1. 刺激GDP增长。将为欧盟带来年均682亿至1192亿欧元、为美国带来495亿至949亿欧元的GDP增长。如果按最乐观估计，这意味着将为每个欧美家庭分别带来每年545欧元和655欧元的一次性额外收入。^② 2. 促进外贸增长。欧盟对美出口将提高28%，相当于1870亿欧元的货物及服务贸易。美对欧盟出口将增长36.57%，相当于1590亿欧元。欧美对世界其他地区贸易将增加330亿欧元。欧美对外出口总额将分别提高6%和8%，这意味着欧美将分别增加2200亿和2400亿欧元的出口量。^③经济收益的80%将主要来自于降低非关税壁垒，如降低官僚管制的成本、进一步的服务贸易自由化以及公共采购市场的开放。3. 增加就业机会、稳定劳动力市场。除直接的经济收益外，TTIP还能通过作用于欧美劳动力市场带来社会收益。据初步估算，TTIP不仅将为欧美带来增加就业机会的直接红利，^④美国奥巴马政府最为看重的也是“公平自由的跨大西洋贸易将有利于增加美国数百万个优质就业岗位”，^⑤而且其全面实施必然促进欧美经济活动水平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还将为欧美劳动力市场带来间接好处：不仅可以提升整体薪酬水平并带来新的就业机会，还可将劳动力转移保持在正常的市场配置和经济走势下，减少劳动力市场的波动和风险。这意味着劳动力市场的更加稳定和有序。4. 部门收益。由于TTIP将涉及欧美所有产业部门，因此部门预期收益对于争取产业界支持最有说服力。据测算，TTIP对欧盟对外出口和产出促进作用最为明显的分别是汽车制造（总体增长42%，对美出口增长149%。将带动欧盟汽车产出增长1.5%）、金属制品（12%）、食品加工和化工（9%）、其他制成品和运输设备（6%）。^⑥在美国方面，收益最为明显的部门是汽车制造（59%）、金属制品（22%）、化工（11%）、机电（8.8%）其他运输设备（8.6%）。长期受到高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如安全标准差异）限制的汽车行业，将是欧美从TTIP中受惠最大

^① Office of United States Trade Representative: *Obama Administration Notifies Congress of Intent to Negotiate Transatlantic Trade and Investment Partnership*, 20 March 2013.

^② 目前有多个对 TTIP 经济收益做出预期的分析报告，且计算方法和结果不尽相同。本文引用的预期收益评估数据均来自英国经济政策研究中心于 2013 年发布的报告，该报告是欧盟官方迄今为止唯一引用和认可的“深度”研究结果。参见^③。

^③ Joseph Francois (project leader): *Reducing Transatlantic Barriers to Trade and Investment: An Economic Assessment*. vvi, p2, March, 2013, Centre for Economic Policy Research, London.

^④ Office of United States Trade Representative: *Fact Sheet: United States to Negotiate Transatlantic Trade and Investment Partnership with the European Union*. February 13, 2013. <http://www.ustr.gov/about-us/press-office/fact-sheets/2013/february/US-EU-TTIP>.

^⑤ Obama: *The 2013 State of Union*, <http://www.whitehouse.gov/state-of-the-union-2013>.

^⑥ EUROPEAN COMMISSION MEMO: *Independent study outlines benefits of EU-US trade agreement*. 12 March 2013. [http://www.20130300 MEMO on Study\[1\].pdf](http://www.20130300 MEMO on Study[1].pdf).

的部门。^①

当然，上述经济社会收益预期指标均为最高值，其实现条件是“TTIP谈判全面成功并实施”（即欧美取消全部关税、取消25%的贸易非关税壁垒以及50%的采购非关税壁垒），如果最终谈判打了折扣或落实不到位，其收益预期都将下降。例如，如果双方只达成取消98%关税、10%贸易非关税壁垒和25%采购非关税壁垒的次优协议，TTIP对欧美GDP增长的贡献就将分别减少510亿和454亿欧元，对欧美外贸的贡献将分别减少791亿和581亿欧元。^②在欧美官方的对外宣示中，都将实现经济社会收益的最大化作为TTIP谈判的最终目标。目前，TTIP的首轮谈判已于2013年7月完成，并将于10月进行第二轮谈判。尽管据欧美官方表示，谈判“开局顺利”，但纵观欧美战略协调的历史，其能否获得预期的经贸和战略收益，还取决于欧美各自的内部政治、经济和社会因素。但欧美官方将TTIP视为一项要在艰难时期显示“团结和信心”的“政绩工程”，因此已为谈判定下了“必须成功”的调子。

（二） TTIP 的战略意图

从欧美现有经济实力和TTIP设置的最高目标来看，它绝不仅仅是通常意义上的“双边自贸协定”，尽管实现经济目标很重要，但TTIP更具有在“地缘政治、地缘战略、政治和经济等多个层面”强化欧美协调的战略意义。^③根据现有观点进行分析，TTIP的主要战略意图包括：

首先，激发欧美经济潜力，深化欧美经济相互依存，稳固其在水世界经济中的优势地位。欧美是当今发达经济体的主要代表，正如欧美领导人在宣布启动TTIP谈判时首先提及的，欧美两大经济体GDP产值相加占当今全球经济份额的近一半，其贸易总额占全球贸易量的1/3，对外直接投资占全球总量的1/5。但金融和经济危机对欧美经济造成沉重打击。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欧盟27国2009年至2012年的GDP年均增长率为-0.485%，其总值已从危机前2008年的18.35万亿美元下降到2012年的16.41万亿美元。^④尽管美国情况较好，但其2008年至2012年的GDP年均增长率也仅为0.327%，其总值仅从次贷危机前的14.29万亿美元增长到

^① Joseph Francois (project leader): *Reducing Transatlantic Barriers to Trade and Investment: An Economic Assessment*. vvi, p66, March, 2013, Centre for Economic Policy Research, London.

^② Joseph Francois (project leader): *Reducing Transatlantic Barriers to Trade and Investment: An Economic Assessment*. vvi, p3,p28, March, 2013, Centre for Economic Policy Research, London.

^③ Madariaga Report: *Transatlantic FTA: Boosting Growth at what Cost?* 24 June 2013. <http://www.madariaga.org/events/upcoming-events/843>.

^④ IMF: Report for Selected Country Groups and Subjects, http://www.imf.org/external/pubs/ft/weo/2012/02/weodata/weorept.aspx?sy=2008&ey=2013&scsm=1&ssd=1&sor=t=country&ds=.&br=1&c=001%2C163%2C998&s=NGDP_RPCH%2CNGDP_RPCHMK%2CNGDPD&grp=1&a=1&pr.x=78&pr.y=9.

2012年的15.60万亿美元。欧美经济增长率远低于同期世界其他地区尤其是新兴经济体的增长，当全球GDP总值从2008年的61.22万亿上升到2012年的71.28万亿美元，欧美在全球经济总量中的份额已从2008年的53%（29.9%+23.3%）下降到2012年的44.9%（23%+21.9%）。^①而根据其经济收益预期，一旦TTIP全面落实，欧美经济可因此分别在2012年基础上获得0.7%和0.6%的GDP年均增长，相互贸易和投资也将获得大幅提升。^②因此欧美启动TTIP的首要战略意图是，急需通过更密切的经济合作来释放其经济潜能、刺激GDP增长，以扭转长期低迷的经济走势，阻止其在世界经济份额中的进一步下滑，维护其经济霸主地位。

其次，以双边带动多边并主导全球双边贸易和投资安排走向，打造新的全球贸易、投资规则和机制。长期以来，欧美尤其是欧盟主要将在多边层面推行贸易与投资“自由化”作为主攻方向，但随着WTO多边谈判的停滞和全球双边贸易投资安排的迅速发展，欧盟逐渐转向“以推动双边来带动多边”的思路，推动双边FTA成为欧盟当前的首要经贸战略，欧美路径趋于一致。由于欧美经济规模大、合作程度深、涉及范围广，TTIP谈判在范围和深度上均超过了现有的双边FTA，因此TTIP谈判势必超越当前全球FTA的谈判水平，主导未来全球FTA的发展方向。

另一方面，由于目前欧美之间相互关税已处于3%—3.5%的较低水平，即便按消除双方全部关税的最乐观预期，其对欧美经济的贡献短期效应强，但长期效应弱。^③而根据测算，消除非关税市场障碍不仅相当于在欧美间降低关税15%至20%，而且具有长期效应。^④因此从TTIP的谈判目标来看，在市场准入框架下的“消除、降低或防止贸易和投资障碍”、“提高规则和标准的协调性”、“消除、降低或防止非关税的‘境内壁垒’”以及“建立全球规则和原则”，才是其着眼于长远和未来的主要战略目标。

最后，充实“跨大西洋伙伴关系”，协调欧美地缘战略。冷战时期以遏制欧洲社会主义国家阵营为主要战略目标、以“复兴欧洲经济”的“马歇尔计划”和集体安全组织北约作为支柱建立起来的欧美“跨大西洋伙伴关系”，在冷战结束后经历了一段“疲软期”。作为其主要载体的北约，由于不适应冷战后各国以发展为主要目标的世界潮流而饱受质疑和诟病。欧美双方围绕美国单边主义政策、防务分担以及欧洲自身发展等问题也出现过较大的政治分歧。近年美国推行的“亚太再平衡”战略更引发了欧洲“被美国抛弃”的深度忧虑，以“跨

^① 根据 Madariaga Report: *Transatlantic FTA: Boosting Growth at what Cost?* 24 June 2013. 计算而出。

^② 根据 TTIP 将分别为欧美带来 1192 亿和 949 亿美元的最乐观预期并在 2012 年数据基础上计算得出。

^③ Madariaga Report: *Transatlantic FTA: Boosting Growth at what Cost?* 24 June 2013.

<http://www.madariaga.org/events/upcoming-events/843>.

^④ 欧盟委员会测算结果，转引自 [Davide Tentori](#), *Trade Deal Ambitious but Falls Short of 'Economic NATO'*, [Chatham House](#), 11 June 2013. <http://www.chathamhouse.org/media/comment/view/192287>.

大西洋伙伴关系”为平台的欧美战略协调陷入互信度下降、增长点和动力缺乏的尴尬境地。TTIP与欧美试图在冷战后创建“共同市场”、强化同盟关系的历史一脉相承，将协调经济战略、打造升级版的FTA作为新的增长点，将共同应对经济全球化挑战作为重振“跨大西洋伙伴关系”的新动力，同时糅合了美国“安抚”欧洲、平衡其“两洋战略”的考虑。此外，如果目前欧盟国家约占GDP1.5%的防务开支水平保持不变，TTIP取得的经济收益将为美国的欧洲盟国带来年均20亿到25亿美元的额外军费开支，这有利于欧洲提升其与美国分担防务负担的能力，从而有利于欧美共同安全与防务合作。^①因此从欧美战略协调的角度来看，TTIP具有“经济北约”的功能。^②

三、 TTIP 对国际经贸格局和中国的影响

由于欧美的经济规模、TTIP巨大的预期收益及其“雄心勃勃”的战略意图，这一史无前例的双边贸易与投资谈判尽管仍然前途未卜，但已经对国际经贸格局产生了强烈的“溢出”效应，身处其中的中国也将深受其影响。

（一） TTIP对国际经贸格局的多重影响

TTIP对当前国际经贸格局具有积极与消极因素并存的多重影响。首先，根据其预期收益测算，TTIP将在客观上有利于扩展全球贸易和投资市场、减少市场流动障碍。欧美间消除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等“市场自由化”举措，将对世界范围内的贸易、投资便利化和收入增长产生一定的积极作用。根据欧方报告，TTIP将为除欧美以外的世界其他地区带来1000亿欧元的GDP增长。^③这种增长主要是通过欧美间消除各种壁垒和统一标准来实现。第三国在欧美投资生产的产品可以在对方市场获得减免关税和消除非关税壁垒的好处，也可以通过欧美产业标准的统一和简化而更便利地转战欧美市场并降低成本。例如一旦欧美就汽车安全标准达成一致，能够进入欧洲市场的第三国汽车产品实际上就已经自动达到了进入美国市场的安全标准要求，其在产品设计、制造和推广环节的成本将下降。由于欧美仍是当今全球贸易的主要

^① [Leo Michel, TTIP: A Ray of Hope for European Defense?](http://www.acus.org/blogs/new-atlanticist) July 11, 2013. The Atlantic Council, <http://www.acus.org/blogs/new-atlanticist>.

^② [Davide Tentori, Trade Deal Ambitious but Falls Short of 'Economic NATO'](http://www.chathamhouse.org/media/comment/view/192287), [Chatham House](http://www.chathamhouse.org/media/comment/view/192287), 11 June 2013. <http://www.chathamhouse.org/media/comment/view/192287>.

^③ Joseph Francois (project leader): *Reducing Transatlantic Barriers to Trade and Investment: An Economic Assessment*, p3, March, 2013, Centre for Economic Policy Research, London.

市场，TTIP提供的便利条件和低成本市场环境，将增加其对第三国产品和投资的吸引力。

其次，从其谈判内容和目标来看，TTIP试图维护、改写和创立国际经贸和投资规则。在达成双边协议的基础上利用其影响力改写或创立国际规则，是TTIP的主要目标。根据欧美此前主导国际规则制定的历史经验来看，双方是希望通过首先在相互间就贸易和投资规则达成妥协和一致，进而利用其在世界经济贸易和国际机制中的优势地位，将双边规则逐渐提升至多边层面加以推广，为全球经贸活动“建章立制”，继续主导全球经济治理。从目前的谈判目标来看，TTIP的建章立制将通过两个路径，即既要在传统行业为诸如“知识产权保护”、“政府补贴”和“国有企业行为”等立规矩，以“自由化”的名义维护其内外经贸体制和政策，削弱“非自由经济体”的竞争力，同时还要为电子商务、新能源和环境等新兴产业建章程，抢占在新兴领域的规则制订权和话语权。^①这也是欧美所谓在WTO多哈回合谈判滞后“以双边带动多边”战略的真实含义。目前TTIP已在第三方和全球经济治理层面引起强烈关注，如土耳其等国已表示“有兴趣加入TTIP”，而且欧美和其他一些国家已表现出将TTIP的“新规则”纳入“二十国集团”俄罗斯峰会议程的倾向。^②同时，TTIP制定出的高标准和新规则对于其他双边FTA具有强烈的示范效应，为保持市场吸引力和竞争力，其他双边贸易和投资安排也将被迫跟进或与TTIP设立的规则 and 标准趋同。^③

最后，从战略意图上看，TTIP将有利于稳固欧美在国际经贸格局中的主导地位，增加其与新兴经济体进行战略博弈的筹码。在危机期间，欧美为阻止其经济的下滑态势，提出了危机源于传统与新兴经济体之间产能与消费、外贸进出口等经济结构失衡的观点，进而提出了要实现世界经济“再平衡”的政策目标。作为欧美在国际经贸格局变化中处于被动形势下的主动反应，TTIP是实现这种“再平衡”的重要手段之一。尽管它宣称将“不会以牺牲世界其它地区为代价”，^④但其“跨大西洋伙伴关系”下的排他性、封闭性以及双边互惠性远大于其为第三方和世界经济提供的“好处和便利”，即便TTIP客观上能为世界经济带来一些好处，也只是主观利己、客观利他的“溢出”效应所致。与美国在亚太地区主导的TPP不同，由于欧美经济目前的产业发展水平很高且相互接近，贸易和投资的相互依存度也很高，其相互关税水平、规则 and 标准协调度等自然形成对第三方进入的高门槛。同时，TTIP谈判所涉及

^① *Final Report High Level Working Group on Jobs and Growth*, 11 February 2013. 2013http://trade.ec.europa.eu/doclib/docs/2013/february/tradoc_150519.pdf.

^② [Davide Tentori](http://www.chathamhouse.org/media/comment/view/192287), *Trade Deal Ambitious but Falls Short of 'Economic NATO'*, [Chatham House](http://www.chathamhouse.org), 11 June 2013. <http://www.chathamhouse.org/media/comment/view/192287>.

^③ Joseph Francois (project leader): *Reducing Transatlantic Barriers to Trade and Investment: An Economic Assessment*, p3, March, 2013, Centre for Economic Policy Research, London.

^④ European Commission, *European Union and United States to launch negotiations for a Transatlantic Trade and Investment Partnership*, 13 February 2013.

的竞争、投资和补贴政策等具有较为明显的针对新兴经济体的指向性，即扭转欧美在与竞争中的不利局面。欧美保守派人士更是将“‘金砖五国’经济增速已高达欧美两倍”作为加强战略协调、启动TTIP的主要动力，并从“政治高度”喊出了TTIP是西方“自由世界之必需”的口号。^①欧美试图利用“规则领跑”来提升自身相对于新兴经济体的竞争力，将在很大程度上抑制后者的增长潜力和发展空间，并加快传统经济体与新兴经济体之间的经贸竞争由产品竞争向规则竞争转化。

（二）TTIP对中国的影响

TTIP是在中国第一和第二大贸易伙伴之间进行的双边贸易和投资协定谈判，因此中国是与TTIP利益密切攸关的重要第三方，其内容、目标和最终结果是影响中国经贸结构、政策和未来发展的重大外部因素。

首先，为实现欧美的经济“再平衡”目标服务，TTIP将在贸易方面进一步抑制中国对欧美市场出口并有助于增加其对中国出口，而在欧美间减少投资障碍、统一标准等措施又将起到刺激中国对欧美实体经济投资的作用。为尽快走出危机，欧美近年来都加大了“保市场、拼出口”的政策力度，加之中国外贸结构调整等因素，中国对欧美货物贸易均出现了出口下降、进口增长的情况，中国已成为欧美出口增长最快的市场，对欧美贸易逆差显著下降。^②TTIP旨在降低或消除欧美间贸易壁垒，有利于欧美企业降低成本、提高效率，进而有助于提升欧美产品在包括中国在内的第三方市场的竞争力。同时，欧美将继续通过TTIP升级其对第三方市场的贸易防护体系和产品标准，提高市场准入门槛。针对政府补贴和国有企业问题的相关谈判，就明显具有针对中国企业和产品的性质。在投资领域，由于欧美之间贸易壁垒的减少和消除，中国企业在欧美投资生产的产品将从中得到实惠，因此客观上会促进中国对欧美的实体经济投资，以避免中欧、中美之间的贸易壁垒。

其次，TTIP将通过固化欧美在全球产业链和国际贸易分工体系中的优势地位，对中国在全球产业链和国际经贸格局中正处于上升的态势形成抑制。近年来，中国加大科研投入、通过产品升级换代来提升竞争力，一直是欧美产业界重点关注的问题，“中国制造正向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上端迅速移动”已成为其对国际经贸格局变化的主要判断。这意味着中国将生

^① Alejandro Chafuen, *Expanding And Liberalizing Trade With Europe: A Must For The Free World*, 13 June 2013.

^② 参见汪洋：加强对话促进合作，《华尔街日报》2013年7月9日及欧盟统计局网站，“Euro area international trade in goods surplus of 10.2 bn euro”，http://118.26.57.18/1Q2W3E4R5T6Y7U8I9O0P1Z2X3C4V5B/epp.eurostat.ec.europa.eu/cache/ITY_PUBLIC/6-17122012-AP/EN/6-17122012-AP-EN.PDF.

产并出口与欧美同类型和性能的产品，这一变化将直接作用于国际贸易分工体系：中美、中欧贸易结构正由互补性向互补性与竞争性并存转化。TTIP的主要目标是统一欧美在贸易、投资领域的规则 and 标准，其实质是对外构筑规则 and 标准壁垒，以此来稳固欧美居于全球产业链和贸易分工体系顶端的地位，并直接影响到中国在其中的地位 and 角色。例如，中、欧、美三方移动通信标准不一，一旦欧美间就此达成统一或兼容标准，其市场适应性和竞争力提升，就将直接影响到中方标准的研发、升级和市场推广，中国标准将在全球市场范围内被边缘化，最终只能继续扮演为欧美标准提供设备和产品的角色分工。

第三，在关税、规则 and 标准竞争背后，TTIP提出的是贸易、投资乃至发展模式差异和相互竞争的重大问题，其所代表的“自由市场经济+集团化”的理念、规则 and 政策将对中国现有的贸易、投资乃至发展模式都提出了挑战。“国有企业”、“政府补贴”、“政府采购”以及“所有制和市场透明度”等均是TTIP重点关注并与中国密切相关的问题。现阶段中国的经济结构和发展模式决定了政府在贸易、投资和市场干预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而与政府角色密切相关的国有企业也是中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大宗对外贸易及投资的主体。政府作用和国有企业被欧美认为是中国竞争力的主要来源，但违背其限制政府干预、崇尚自由竞争的“经济法则”，尤其是在以中小企业为主要经济成分的欧洲国家，对于政府对市场的深度介入和超大规模的国有资本，更存在着偏见和担忧，认为中国当前的政府与企业关系“严重扭曲竞争并损害了美欧企业”。^①为此TTIP有意要为国有企业、政府补贴、采购等设定全球标准，以欧美特色的反垄断、反补贴法和并购条款等来规范中国政府和企业的行为。近年来欧美在针对中国的贸易制裁中开始频繁使用反补贴等手段，实际上已经是TTIP的预演。

最后，TTIP将延缓或迟滞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大贸易体和欧美最大贸易伙伴的步伐，并将通过影响中美欧三边关系而使中国发展的国际环境更趋复杂。中国对外贸易发展迅速，目前全球已有123个国家认为中国是其最大贸易伙伴，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并有望超过美国成为第一大贸易体。欧美将其与中国的竞争解读为“如何争夺除欧美之外全球90%的消费者和70%的购买力”，因此需要采取TTIP这种“内联外拒”的战略和措施来提升贸易和投资总量，并限制或延缓中国扩大贸易和对外投资的步伐。^②目前中国已分别是欧美第二大贸易伙伴，且距成为其第一大贸易伙伴的目标已非常接近，但如果TTIP得以实施，随着欧美相互间贸易量的增长，实现这一目标的难度将加大。而TTIP的地缘战略意义将直接影响到未

^① Glyn Moody, *Leaked EU Policy Papers Show TAFTA/TTIP's Huge Challenges -- And Some Subtle Signals*, 9 July 2013.

^② Peter H. Chase: *Dynamics have to change to deliver EU-US trade deal*, 13 June 2013.

来的中美欧三边关系，使中国面临的国际形势更趋复杂。欧美可以利用TTIP强化其伙伴关系基础，而同样以经贸关系为基础的中美关系和中欧战略伙伴关系则可能因此受到削弱，国际政治多极化发展的动力也可能因此减弱。在美国的全球战略中与TPP功能相似的TTIP一旦得以实施，那么中国将在地区层面和全球层面同时承受来自TPP和TTIP的压力。

英国保守党何以老而不衰？

史志钦

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教授，中欧关系研究中心理事会副主席

载于《当代世界》2013年第9期

英国保守党是英国的两大政党之一，也是世界历史上最早的现代政党之一。如果从其前身托利党成立（1680年）算起，保守党应该有300多年的历史。不仅如此，与其他政党相比，保守党又是英国历史上执政时间最长的政党。自1900年以来，保守党执政多达60余年，其中单独执政共47年，共六次，反比工党单独执政30年，共5次，自由党共9年，仅执政1次。由此可见，保守党单独执政的时间超出其他两大政党掌权时间的总和。

这期间，保守党虽然也曾多次出现危机，包括1997年至2010年长达13年的危机，但它总能最终转危为安。2010年5月，保守党与自由民主党组成联合政府，开启另一段的执政历史。保守党“老而不衰”既有其自身的保守特性与英国的社会传统吻合的原因，又与英国选举制度对小党有利及其政敌的分裂与失误有关。但更重要的原因是保守党理论和意识形态上的灵活性与实用主义及党组织的高度凝聚力和与时俱进精神。

保守党并不保守

保守党之所以经历沧桑，老而不衰，躲过一次又一次危机，首要原因是理论体系的非教条性和政策的灵活性。人们谈论起英国保守党，自然很容易地把它与保守主义的意识形态联系起来，认为保守党的意识形态一定是保守的，内外政策势必僵化而缺乏弹性。其实，这是一种相当错误或偏颇的观念。恰恰相反，实际上与英国的其他政党如工党、自由党、自由民主党及共产党相比，保守党的理论和形态最缺乏系统性和连贯性，其内外政策最为实用主义，

有学者用“非教条性”、“发展性”和“兼容性”来描述保守党的理论。^①

保守主义理论起源于19世纪初的托利主义，此后先后经历伯克主义、迪斯雷利主义、新保守主义以及撒切尔主义等不同称谓。^②这诸多不同的称谓显示，保守党在坚持其核心理念的同时，折射出其在历经英国社会变迁后的理论调整 and 变化。托利主义是反映托利党人最初维护王权和封建贵族统治的理论。它主张维护英国的传统社会秩序，反对革命和剧烈的改革，尤其是在改革浪潮来临时，托利党逆势而又缺乏对策，顽固保守，始终把托利主义当作灵丹妙药，仇视任何新生事物。在19世纪30年代英国社会发生巨大变化的情况下，这种思想显然已经落伍，导致保守党内出现分裂，各派矛盾激化，组织失去活力。1833年，罗伯特·皮尔及时地提出了“新保守主义”的概念。新保守主义在强调维护现存政治制度，维护统治阶级根本利益的同时，也应支持当时必要的改革法案，只是要求这种改革必须小心谨慎，避免过激方式。这一思想恰好与当时的辉格党政论家埃德蒙·伯克的观点不谋而合，因而被称为伯克主义。伯克在反思法国大革命的基础上告诫自己的同胞维护本国等级和地位差别等基本政治秩序的必要性，如果迫不得已需要变革，那也要通过保持连续性，不能打破旧有的正常秩序，不能引起社会的动荡。自此至19世纪70年代之前，伯克的观点反而被保守党所接受。这样，伯克主义成为保守党长时期内的思想准则。

19世纪中叶开始，英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形势继续发生深刻的变化。随着资本主义的快速发展，新兴的中产阶级选民不断增多，工人阶级日益壮大并有了自己的主张。与自己的竞争对手自由党相比，保守党的政策主张和理念越来越跟不上时代发展的步伐，因而在竞争中经常处于被动局面。这时，以本杰明·迪斯雷利为代表的保守党领袖集团则能善观形势变化，改革保守党的理论基础，在继续强调传统的维护国家体制和秩序同时，还要改善人民的生活条件，关心人民的利益。这一理论调整改变了伯克主义的不信任人民的偏见，进而被捧为“深得民心的保守主义”。不仅如此，迪斯雷利还迎合时代潮流，推行一系列的社会改革措施。1867年，迪斯雷利政府进行宪法改革，赋予许多工人以选举权；1874年颁布了工厂法，1875年又颁布了《公共健康和手工业工人住宅法》等。迪斯雷利的这些改革，使得保守主义获得新的活力，为日后保守主义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保守党又经历一次重大的理论调整。战争结束之际英国举行大选，满以为稳操胜券的保守党及其党魁丘吉尔却遭受意想不到的失败。丘吉尔及其同僚踌躇满志地认为，保守党刚刚领导英国赢得战争的胜利，功勋卓著，在国内外享有很高的声望，

^① 刘建飞：《英国保守主义的主要特性》，《国外社会科学》，1997年第6期。

^② 同上。

赢得选举胜利毫无悬念。但保守党人万万没有想到，英国选民并不领情，因为这时英国的国内外环境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时国内和国际政治流行的思潮是社会主义及经济上的凯恩斯主义，保守党的政策主张显然已不合时宜。失败的残酷教训促使保守党人反思，结果保守党接受了工党主张的凯恩斯主义和社会福利政策。战后英国政治史上出现了两大党在主要政策上特有的“共识政治”。1951年，保守党重返政府并连续执政13年，很大程度上是这次政策调整的结果。70年代初，“共识政治”不再奏效，保守党的中坚力量要求改弦易张。1975年，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当选为保守党主席，下令成立一个“经济建设小组”，更新党的政策。1977年该小组制定了一份题为《经济成功之路》的文件，放弃了曾影响英国经济政策多年的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成为时尚。1979年撒切尔夫人当选为英国首相，大刀阔斧地推行改革，改革措施包括控制通货膨胀，改革税制，推行市场化、国有企业私有化、削减社会福利，严厉打击工会组织等。媒体和学界将撒切尔的这些改革政策和理念冠名为“撒切尔主义”。

撒切尔主义政策实施后不过数年，以“滞胀”为主要症状的“英国病”得以治愈，英国经济发展速度再次居于西方国家前列，保守党也凭此政绩连续四次在大选中赢得胜利，执政时间长达18年，创下了英国政党四次独立执政的历史记录。但是由于该政策过分注重经济效率及私有化措施，结果造成了社会前所未有的社会分化，且随着其任期的增加，客观上也造成保守党在思想理论上因循守旧和缺乏创新，党内矛盾丛生，危机四起。这时，在野十几年的工党在经历痛苦的转型之后，在新生代领袖托尼·布莱尔领导下提出了第三条道路理论，旨在极端保守的撒切尔主义和旧工党的社会民主主义之间走中间道路。在第三条道路指引下，英国工党改造为新工党，从1997年到2010年，连续三次赢得选举胜利并单独组成政府，一度使得工党达到巅峰，创造了工党选举和执政的历史记录。此时的保守党则陷于全面地低谷之中，党内分裂倾向严重，党的肌体缺乏活力，党员队伍日益萎缩，给人一种“沉闷守旧”的不佳形象。工党执政的13年，是保守党备受煎熬的岁月。党内气氛沉闷，失望情绪弥漫，领导层分歧严重，组织缺乏活力。在经历数次选举失败和领袖更迭后，保守党最终推出了眉目清新，充满生机与活力的新生代领导人戴维·卡梅伦。鉴于撒切尔时期推行的原教旨主义市场经济和工党借鉴保守党经济与社会政策成功经验，卡梅伦对保守党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根据世情、国情和党情的变化，在意识形态、党内民主和社会管理等方面调整党的理论和方针政策，在坚持传统实用主义的同时将党的政策立场定位于中间偏右，打造现代而又亲民的政党新形象。2010年5月，卡梅伦不负众望，在选战中击败工党。但由于在议会中不占绝对多数，保守党毅然放弃意识形态的纯正，坚持传统的实用主义，甚至与本党意识形态具有差

异的自由民主党组建联合政府，摆脱了十几年来保守党屡败屡战的形象。

有民主，更有集中统一

谈起西方政党，人们一般认为他们都是民主政党，他们往往是强化民主自由而淡化集中和权威。但在实际生活中，情况远非如此，英国保守党更非如此。毋庸置疑，英国保守党在经过几百年的演变和发展中已经成为一个符合自由民主标准的现代政党。它既有相互独立的组织系统，又有保证其团结统一的纪律约束和道德规范。但从其理论和实践来看，保守党是一个高度集权的政党；正是它的高度集权和严格纪律，才最终保证了党的团结统一。高度集权的组织结构，使得党内纵有林林总总的派别和组织，如弓集团、星期一俱乐部、塞尔顿集团、保守党改革集团等，^①这些派别和集团虽也会因意识形态和政策理念的差距而经常内斗不断，但为了党的最终目标和利益，他们很少达到内讧和严重分裂的地步。如保守党所宣称的那样，他们“自己拥有长期的高度共识，几乎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派别，没有观点上的实际分歧，只有基于保守主义理念的高度一致”。^②确实，与英国自由党和工党相比，保守党内派别活动相对较少，长久剧烈的党派对立更少，多数内争均能以温和的方式进行，党内分歧通常不会对领袖地位构成较大威胁，也不会导致党的严重分裂。

更重要的是，由于保守党在意识形态上始终没有不可调和的矛盾，党内的派别斗争总是围绕着如何为维护与增强党的威望而进行，中心目标是为了巩固或争取执政党的地位，而非另立山头，制造分裂；甚至有人为了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会忍痛退出权力圈子。^③例如，1922年，保守党因与自由党和工党合作问题发生分歧，由于两派领袖采取说服工作和民主表决方式，进而解决了意见分歧，维护了党的团结。再如1975年希思和休·弗雷泽为了顾全大局，适时地宣布退出党内领袖竞争，让位于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1990年11月，当撒切尔政府的政策处于内外交困、保守党信誉不断下跌之际，为了避免党的分裂，撒切尔夫人同样含泪辞去首相职务，退出党内竞争，并推举其门生、财务大臣梅杰参加领袖选举。如她将这一决定通知内阁时潸然所说，“如果我能退出，让内阁同僚参加竞选，这对党的统一和大选胜利有益。”在领袖选举中，梅杰的支持率未超过规定多数，随后其竞争对手赫塞尔廷和赫德自动退出竞选，并号召保守党团结在新领袖周围。梅杰执政后，为加强党内团结，捐弃前

^① 胡康大：《英国保守党内的派别活动》，《西欧研究》，1986年第6期。

^② Ivor Crewe and Donald D. Searing, "Mrs. Thatcher's Crusade: Conservatism in Britain 1978-1986", in Barry Cooper(ed.), *The Resurgence of Conservatism in Anglo-American Democracies*, Durham and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88, p.263.

^③ 阎照祥：《二十世纪英国保守党政治优势析要》，《史学月刊》，1996年第6期。

嫌，把赫塞尔廷和赫德均延揽入阁，避免了保守党的重大分歧。

保守党之所以具有高度的党内凝聚力固然密切联系于其共同的理念，但党内集权与权力制约的有效结合也十分重要。首先，从保守党的组织结构来看，三大结构（议会党团、中央总部和全国联合会）之间没有隶属关系，只有工作上的协作关系。议会党团是全党的核心，无论是执政还是在野都要承担党的全部工作，它不仅掌握着各项法案的讨论及表决权力，更重要的是它掌握着选举领袖的权力。全国联合会是议会外保守党的全国群众性组织，主要任务是在议会外从事宣传和组织工作，扩大保守党的影响，为议会党团服务。中央总部则发挥连接议会党团和群众组织的桥梁作用。三者的关系是，议会党团是核心，后两者的工作更主要是地服务前者。其次，党的三大结构最终以党的领袖为核心，接受领袖的领导。保守党的领袖通过其任命的督导员来控制议会党团，促使所有议员根据其意志行事，对于违纪的议员，领袖有权对其制裁，直至开除出议会党团。同时，党的领袖还可以通过其任命的党主席来控制中央总部，进而影响全国联合会。因此，党的领袖实际上成为保守党组织机构的一部分。^①由此可见，保守党实际上又是一个领袖高度集权的政党。

权力意味着责任和义务。保守党领袖具有如此大的权力也意味着他肩负的巨大的责任和义务。这就要求党的领袖具有足够的智慧和超人的能力来驾驭全党、领导全党。如果党的领袖不称职，不能领导带领大家夺得大选的胜利，或者一挫再挫，同样会被选举其成为领袖的议会党团议员所罢免，因为决定谁来做党的领袖或做多久党的领袖的权利来自全体议会党团议员。历史上的爱德华·希斯、阿瑟·鲍尔弗，以及上个世纪末和本世纪初的几任领袖如威廉·黑格、邓肯·史密斯、迈克尔·霍华德等，他们无不是因为在保守党面临困境与失败时未能带领本党取得胜利而主动请辞或被赶下台。这种“适者生存”的残酷淘汰机制始终是保持党的生机与活力的法宝之一。

与时俱进，永葆党的生命力与战斗力

任何政党最初都是某个特定阶层的代表者，但是多数政党的发展历史证明，只有与时俱进地扩大党的基础，才能最终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战斗力。19世纪上半叶以前，托利党、保守党一直封建土地贵族的忠实代表，但是随着工业革命和民主政治的发展，这个集团在经济和政治领域中的优势逐渐丧失。这时如果保守党继续坚守其狭隘立场，难免会被新兴的社会

^① 刘建飞：《英国政党制度与主要政党研究》，北京：中国审计出版社，1995年版，第70—87页。

集团所抛弃。实际上，19世纪三十年代的保守党“重建”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①针对英国社会不断出现的新兴阶级集团，保守党先是向上层资产阶级敞开大门，该集团曾以反对封建专制起家，但随着新兴中产阶级及工人阶级的崛起，这些上层资产阶级也转变成为现有秩序的维护者。他们的加入使得保守党逐渐从土地贵族的主要代表者转变成为上层资产阶级的主要代表者。接下来，保守党又不得不开始向日益壮大的新兴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开放，以吸收新鲜血液，改善党的结构，扩大党的队伍。否则，如19世纪保守党领袖兰多夫·丘吉尔指出的那样，如果不能获得工人阶级的信任，保守党即无法取得政权。保守党数个世纪的发展轨迹反复地证明了这一铁律，否则，无论托利党还是保守党都早已成为历史概念。

二战之后，英国先是经受福利国家和国有化混合经济的影响，然后是受撒切尔主义及保守党政府所推动的市场经济，国有企业私有化，鼓励私人资本等政策的影响。两场革命性的变革虽然性质完全不同，但其对英国社会阶级结构的影响是深远的，社会结构的变化势必会影响到党的阶级基础。尤其是在保守党执政的十几年中，英国的社会结构变化显著，由商人、经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和高级文职人员为核心的中产阶级队伍进一步扩大。这些人员大大得益于保守党的经济和社会政策，进而成了支持保守党的稳定支持者。相反，工党的社会基础却在不断地萎缩。由于撒切尔政府严厉打压工会，也由于始于80年代的信息科技革命，服务业为主的第三产业迅速发展，传统的制造业萎缩，蓝领工人减少，这些变化无不在侵蚀工党的阶级基础。在这种背景下，工党在年轻领导人托尼·布莱尔领导下，掀起了名为“第三条道路”的社会民主主义变革，强调要在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之间进行折中，明确接受撒切尔主义中行之有效的政策，其实质上是社会党的新自由主义化趋势，占领选民的中间地盘。以1997年工党执政为标志，结果工党以保守党的衰落为代价，使工党朝着良性阔步发展，工党的群众基础大大拓宽，党员队伍扩大一倍，达到40万。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保守党党员队伍不断萎缩，在1970年代它尚有150万，而到了1996年则坠降到40万，党员平均年龄高到64岁，35岁以下的人占不到5%，保守党几乎成为一个了老人党。鉴于这种情况，保守党于1997年适时地提出一套改革方案，确定要到2000年将党员人数扩大到100万。为此，保守党特别强调扩大党员成分，吸收更多的年轻人、有色人和妇女入党，以改变保守党是“白人党”、“男人党”和“富人党”的形象。2005年12月，39岁的戴维·卡梅伦当选为保守党党魁后更是把改变保守党形象作为改革目标，强化党的大众性质，淡化其精英特色，增加年轻和女性议员的数量。卡梅伦及其力主的亲民形象构建，给沉闷的保守党政坛带来一股清新空气，最终在在野13年之后使得保守党东山再起，扭转了连续三届选举败北的局面。

^① 潘兴明：《论英国保守党的“重建”》，《世界历史》，1988年第11期。

总之，保守党能够历经数世纪并在英国政坛中居于政治优势地位，不仅有赖于其自身的特点，更在于它能适应时代的变迁，与时俱进，适时地调整自己的理论和政策，增强自己在变革时代的生存力和适应性，使其顺利地完成了从主要代表土地贵族的托利党向主要代表大资产阶级并面向选民的现代政党的转变。

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与民族认同

张利华

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教授，中欧关系研究中心主任

载于清华—卡内基全球政策研究中心网站

一个国家的文化价值观影响着国民心理和民族认同，大多数国民的价值判断和公众舆论通过媒体和各种信息渠道传达给国家领导人，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领导人的对外决策。

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是什么？它们是：和谐、仁、义、礼、智、信、忠、孝等，其中起着统领作用的核心价值观是和谐。

和谐的意思是“事物之间配合得适当和匀称”。即合理、适当、恰到好处。合理，就是按照客观规律和真理法则做事，适当就是适宜、妥当、恰如其分。和谐价值观倡导的是和而不同，不同事物的合理搭配，恰如其分地组合或融合，事物由不协调达致协调，由不匀称达致匀称，由不平衡达致平衡。在现代社会，和谐追求的是人与自然和谐，人与社会和谐，人与人和谐，自我身心和谐。

仁是儒家倡导的核心价值，也是中国人普遍尊崇的价值观。它是由血缘亲情扩展而来的。“家和万事兴”是我们中国人普遍信奉的至理名言。这种带有血缘亲情的仁爱价值观延伸扩展到朋友和社会关系之中，形成了正义、礼仪、智慧、诚信、忠诚、自强、厚德等一整套价值体系。

义是指正义和正当。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人不仅有个人利益，还有集体利益和社会利益。人们应当把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相结合。“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当自己的祖国遭受外敌侵犯，处于危难之际，要“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挥戈上阵，赴汤蹈火，甘洒热血写春秋。

礼强调做人要谦虚谨慎，使自己的言行符合礼法，不肆意妄为。中国传统文化崇尚礼仪，有皇帝祭天的礼仪，有平民祭祖的礼仪，有婚丧嫁娶的礼仪，有迎宾的礼仪，日常生活中还

有礼尚往来的礼仪，正所谓“来而不往非礼也”。在日常生活中孔子特别强调礼貌待人。

智是指明辨是非，知人善任，有自知之明，有智谋。

孔子说：“仁者爱人，仁者知人”，爱人就是做人要有爱心，知人就是做人要有智慧，善于识别人。人不仅要有爱心，同时还要善于识别好坏、善恶和是非。要有抑恶扬善的智慧和智谋。中国历史上有一批既爱人又知人的爱憎分明的杰出人物，如汉武帝时期的军事将领卫青，唐太宗时期的名相魏征，北宋名相寇准、清官包拯，明朝清官海瑞、抗倭名将戚继光等。

信是指讲信用，诚实守信。孔子倡导人要靠自己的劳动而合理、适宜地取得财富，不要靠坑蒙拐骗获取财富。在日常生活中，孔子强调说话做事要守信用。诚实守信，是中国人非常看重的一种道德品质。中国历史上有许多儒商用诚实守信原则办企业，形成了百年不倒“老字号”的企业。

忠强调国民要忠于自己的祖国。这是由血缘亲情演化而来的一种情感和价值观。当自己的祖国遭受外来侵略的时候，就像自己的家庭遭受破坏一样，要竭尽全力保卫祖国，“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忠还包括君子要对自己的家庭忠诚，对朋友忠诚。

孝也是儒学非常重要的一个价值观，“尊老、敬老、养老、送老”是儿女的天职。“老有所养，少有所依”是最基本的家庭美德。

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在新中国外交领域有明显的体现。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和而不同

和谐思想认为，宇宙存在着多样性的统一。差异不等于矛盾，事物之间的差异有时候会演化成矛盾，有时候则是和谐的必要条件，自然和社会有许多因差异而紧密合作的例子。这种“多样性的统一”是新事物生成的基础。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指的是君子有不同的观点，不盲目附和别人，却能和谐共处。

20世纪50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就是和谐思想在中国对外战略上的体现。半个世纪以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被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接受，成为规范国际关系的重要准则。

2002年12月24日，前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访问美国发表的演讲就阐述了中国外交的“和而不同”的理念。他说，两千多年前，中国思想家孔子就提出了“君子和而不同”的思想。和谐而又不千篇一律，不同而又不相互冲突。和谐以共生共长，不同以相辅相成。“和而不

同”，是社会事物和社会发展的一条重要规律，也是人们处世行事应该遵循的准则，是人类各种文明协调发展的真谛。我们主张，世界各种文明、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应相互交流和相互借鉴，在和平竞争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

2003年末，温家宝总理在哈佛大学发表演讲说：“中国之所以选择一条和一些大国不一样的和平崛起之路，就是因为我们有自己的文化、源远流长的文化，这种文化的核心就是和为贵，就是和的文化，当然我们还要和而不同，这种不同是相互补充，是相互借鉴，而不是冲突的来源。”2005年5月，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主席在联合国首脑会议上提出了建设“和谐世界”的概念。

“互不干涉内政”是中国政府奉行的一条很重要的对外政策。当一个国家内政出问题，其他国家插手干涉这个国家的内政，趁机煽风点火，支一派打一派，这种干涉别国内政的做法是不道义的。中国近代历史时期曾经遭受过西方列强的侵略、掠夺和干涉内政，西方列强迫使中国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所以，中国人民对于外国干涉内政很反感，很不赞同。

大国尊重小国

老子的《道德经》说：“大邦者下流，天下之交也，天下之牝，牝常以静胜牡，以静为下。故大邦以下小邦，则取小邦；小邦以下大邦，则取大邦。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大邦不过欲兼畜人，小邦不过欲入事人。夫两者各得其所，大者宜为下。”意思是说，“大国要像居于江河下游那样使天下百川交汇于此。大国对小国谦下，就可以取得小国的信任；小国对大国谦下，就可以取得大国的信任。所以，大国应当以谦和取得小国的依赖，小国应当以谦下取得大国的合作。大国不要有统治小国的过分欲望，小国不要过分地去奉承大国。大国小国都各自达到自己的愿望，大国特别应该谦下”。

老子还说：“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意思是说，“江海之所以能成为千溪百川之首领，是因为它总是处于最低下的位置。……正由于不与人争，因而天下的人都无法与之相争。人类唯有从相争相残转变为和衷共济，共存共荣，人类社会才有希望”。

这种观点运用到中国对外战略上，就会倡导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大国强国不要欺负小国弱国。大国不要以本国价值观和政治制度为标准去衡量其他国家，更不应该对不符合自己的价值体系和制度标准的国家加以蔑视、打击甚至消灭。不管是大国还是小国，各国都应当互相尊重，取长补短，共存共赢。

最近,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就欧盟决定禁止成员国从伊朗进口石油并对伊朗中央银行实施制裁问题发表讲话,表示中方一贯主张通过对话和协商的方式解决国际争端。中方一向反对对伊朗的单边制裁,更不赞成扩大这种制裁,施压、制裁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伊朗问题,反而会使问题复杂化、严重化,加剧对抗,也不利于地区和平与稳定。当前形势下,有关各方应加强对话合作,通过谈判妥善解决伊朗问题。

中国对非洲国家的援助、投资贸易不附带任何政治条件,体现了大国尊重小国、穷国的态度。由于中国近代遭受过许多外国强加的不平等条约和借款的附加条件,有过切肤之痛。所以,中国对附带政治条件的投资贷款的做法十分反感,也很不赞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在处理邻国关系上,中国政府提出“睦邻、安邻、富邻”的外交方针,中国政府大力推动朝核问题六方会谈,扮演着协调人的身份,在协调朝美矛盾、缓解对抗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上海合作组织”也是中国与俄罗斯及中亚五国本着互利、合作、共赢的原则建立发展的,10年来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中国与东南亚联盟、印度、巴基斯坦等周边国家开展平等的交流与合作,充分体现了大国尊重小国的思想。

高处不胜寒

和谐价值观强调全面、辩证地看问题,反对走极端。《易经》乾卦有一个警句说:“亢龙有悔”,意思是说,龙飞到极高的地方会因空气稀薄寒冷窒息摔下来而后悔,说明极端的状态不能持久。老子的《道德经》曰:“物壮则老。”意思是说,过分的强壮的东西就容易趋于衰老。这些至理名言告诉我们,大国不要走极端,不要追求登峰造极的状态。2010年3月14日温家宝总理在会见中外记者时所说:“中国的发展不会影响任何国家,中国不发达的时候不称霸,中国即使发达了,也不称霸,永远不称霸!”就体现了这一思想。

老子说:“企者不立,跨者不行。自见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无功;自矜者不长。”意思是说:“踮起脚跟想要站得高,反而站立不住;跃起大步想要快走,反而行走不快。自我显扬的反而不能彰明;自以为是的反而不能昭彰;自我夸耀的反而不能见功;自高自大的反而不能作众人之长。”这种思想告诉我们,当一个国家日益强大时,不要自以为是、骄傲自大,更不要刻意追求世界老大。在中美关系中,中国不挑战美国的“老大”地位,在不涉及本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不直接对抗美国,善于平衡协调中美之间的利益矛盾,与美国保持“非敌非友”的关系,就体现了这种政治智慧。

合理地斗争

和谐价值观，对于非对抗性的矛盾要尽量用协商、协调、平衡的方法去处理，使不协调达到协调、不平衡达到平衡。但是，对于对抗性的矛盾，如外国侵略我们的国家，我们要坚决进行自卫反击，用正义的战争对付非正义的战争。中国有句老话：“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对来自其他国家的欺负、压迫、侵害，要敢于斗争和善于斗争，运用政治智慧和各种手段进行斗争。中国古代的《孙子兵法》就提供了对敌斗争的智慧。所以，中国传统文化不仅有孔子的儒学，还有对敌斗争的《兵法》。譬如，在南海问题上，面对挑衅中国主权海岛的菲律宾，中国政府尽量以外交手段，通过和平谈判解决问题，但是，为了捍卫本国的主权、领海和岛屿，在需要的时候，也要进行坚决的斗争。

天下为公，世界大同

中国传统文化价值体系追求的理想社会是“天下为公，世界大同”。为了实现这一理想目标，和谐价值观倡导国家之间互相尊重，和平与合作，共存共赢。这些思想在中国政府的对外政策中有明显的体现。进入新世纪以来，“和平发展”、“和谐世界”、“互利共赢”成为中国的外交战略。2009年9月23日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联合国提出了“坚持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

胡锦涛主席提出“建设和谐世界”的理想目标直接体现了中国传统和谐价值观，这种提法在国际社会是前所未有的。建设和谐世界，就是要让每一种文明都存在，让每一种文明中的每一位社会成员都焕发生机。它与弱肉强食、“丛林法则”、强权政治的价值观完全不同，它提供了一种解决国际冲突的新思路。

陈新做客强国网 聚焦李克强出访中东欧

陈新

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研究员，清华大学中欧关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载于人民网 2013 年 12 月 2 日

[嘉宾访谈]:12月2日13时，中国上海合作组织研究中心秘书长陈玉荣、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经济室主任陈新做客人民网强国论坛，以“聚焦李克强出访中东欧及出席上合组织成员国总理会议”为题与网友进行在线交流，欢迎参与。[23:38]

[陈玉荣]:各位网友大家好！[13:01]

[陈新]:大家好！[13:01]

[网友一楼拜强坛]:李总理此次出访罗马尼亚是其就任以来首次访问中东欧国家，也是中国总理近20年来首次访罗，您对总理此行的目的和重要意义作何解读？[13:04]

[陈新]:这次总理访问应该讲是两个目的，一个目的是20周年作为中国的总理第一次访问罗马尼亚，这对促进中罗双边关系的发展会起到积极的作用。

中国和罗马尼亚应该讲是有着悠久的友谊和合作传统，相信这次访问会对增进双方的友谊和合作，增加新的动力。这是第一个目的。

第二个目的是出席在罗马尼亚举办的中国中东欧领导人第二届会晤和第三届中东欧经贸论坛。中国和中东欧的合作是从前年开始的，当时是温总理访问匈牙利，在匈牙利搞了第一届中东欧经贸论坛，去年是温总理访问华沙，举行了第一次中国—中东欧领导人会晤，并在华沙正式提出了建立中国中东欧合作机制的倡议。这一次李总理对罗马尼亚的访问，并出席在布加勒斯特举行第二届中国中东欧领导人会晤，和第三次中国中东欧经贸论坛，实际上是中国与中东欧合作的新的延续和深化。

李总理的此次访问，在时间的选择上有着一定的意义。一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刚刚结束，中国即将启动新一轮改革开放。二是中国欧盟领导人会晤刚刚在北京结束，中欧关系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在这种背景下，李总理在三中全会后的首次出访是为了推动中欧关系的发展，同时进一步推动中国与中东欧合作的深入进行。

另外从国家的选择上，也有一定的考虑。在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合作机制中，有16个中东欧成

员国，中国与匈牙利有着传统的友谊和合作关系。波兰和罗马尼亚都是中东欧的大国，这一次罗马尼亚承办第二届中国中东欧领导人会晤，也凸显罗马尼亚在该地区的地位和作用。

[13:09]

[网友海小棠]:请问本次上合组织成员国总理会议是在什么背景下召开的？您对这次会议所取得的成果有何总体评价？其中让您印象深刻的亮点与突破有哪些？ [13:10]

[陈玉荣]:这次塔什干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总理会议，是在十分重要的时间节点举行的。也就是说，是在上合组织进入第二个十年的初期举行，又是在今年9月上海合作组织比什凯克峰会召开不久举行的这样一个高层的领导人会晤。根据《上海合作组织宪章》规定，上合组织总理会议的职能是落实峰会的共识，部署推动上合组织在各个领域的务实合作。这次会议另外一个背景，就是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对上合组织的期待不断提升，各国对深化上合组织框架内部的务实合作需求不断增加，共谋发展的愿望更加迫切的背景下举行的。

这次总理会议取得了多项成果，总理们共同签署了联合声明等。会议的亮点和突破主要体现在交通和金融领域的合作。会上发表了《成员国总理关于进一步开展交通领域合作的联合声明》，《声明》强调了推动上合组织成员国之间交通合作的重要性，挖掘交通领域合作潜力的必要性和加强互联互通合作的迫切性。这一文件特别强调上合组织的优先任务是尽快签署《上合组织成员国政府间国际道路运输便利化协定》，总理们就“要想富先通路”达成新的共识。李克强总理在他的讲话中特别强调，互联互通是上合组织深化合作的基础。

第二个亮点是，总理们批准了《关于成立上合组织开发银行和发展基金下一步工作的决议》。

[13:13]

[网友中街老叟]:罗马尼亚媒体这几天纷纷对中国总理的到来做出积极评价。陈主任，您能不能谈谈您对于总理此行的直观印象和感受？您认为其中最大的亮点是什么？ [13:17]

[陈新]:这是一次准备充分的访问，李总理在罗马尼亚停留70个小时，出席30多场活动，不仅包括中罗之间的双边会谈，还包括中国与其他15个国家的领导的双边会谈，以及1+16的领导人会晤。

同时还签署了一系列合作协定，相关企业也签署了一些商业合同，将把中国与中东合作落到实处。与此同时，罗方对这次访问也予以高度重视，罗马尼亚总理亲自率政府成员到机场迎接李总理，凸显超规格的接待待遇，也反映出罗方对发展中罗关系和中国与中东合作的热烈期待。 [13:18]

[网友彩练当空]:陈秘书长，此行是李克强首次亮相上合组织总理会议，通过这次会议体现

了李总理怎样的工作风格？您认为李总理为什么在他的讲话中强调交通和金融领域的合作？ [13:20]

[陈玉荣]:自上任以来, 李克强总理第一次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总理会议。所以, 各方对李总理的到来都充满期待, 李总理在会议期间以其真诚友善、务实高效的工作风格, 给各界留下了深刻印象。特别是李总理在他的讲话当中, 对于深化上合组织框架内的务实合作提出了六点倡议, 其中特别强调了加强上合组织框架内交通和金融领域合作的重要性。我们知道上海合作组织已经走过了第一个十年, 第一个十年是上合组织建章立制的初创阶段, 第二个十年是上合组织务实合作的重要阶段, 也就是说, 是上合组织打造务实合作升级版的重要时期, 而这一时期的中心任务就是深化上合组织各领域的务实合作。而深化各国之间的合作一个重要的前提, 就是要加快成员国之间道路的互联互通; 另外就是为上合组织框架内的重大经济合作项目提供资金支持。换言之, 交通是上合组织成员国深化经济合作的前提和基础, 尽快启动上合组织开发银行这样的融资平台则是深化经济合作扩大贸易往来的重要支撑。

[13:21]

[网友大辽]:嘉宾能不能给咱们说说, 中国与中东欧的合作中对对方的最大期待是什么? 中国与中东欧各国如何实现优势互补? [13:23]

[陈新]:中国与中东欧国家有着传统的友谊和合作, 但近20年来中东欧国家在转轨的过程中, 主要把加入欧盟和融入欧洲一体化作为对外政策主要目标。中国在这20年中实行改革和对外开放, 积极加入经济全球化。

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促使双方“重新发现”对方。一方面由于欧盟自身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 和深陷债务危机的冲击, 中东欧在资金上出现缺口; 另一方面, 中国也在积极开拓走出去战略, 寻找经济增长的新的亮点。因此双方的合作一拍即合, 优势互补, 互利共赢。

中欧国家对中国最大的期待是希望中国对该地区的投资, 通过产业投资带动就业和经济增长。同时, 由于这个地区的基础设施相对薄弱, 尤其在高速公路和铁路建设方面, 资金存在缺口, 也希望能够吸纳更多的外来投资的参与。而对中国来说, 中东欧地区的劳动力成本一定意义上不比中国沿海地区高, 中国企业进入中东欧地区可以进一步接近欧洲市场。另外, 国内部分产能过剩, 尤其在光伏等领域, 中国通过投资可以转移一部分产能, 并合法规避欧盟的贸易壁垒。

三是中国在基础设施领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通过在中东欧的投资与合作, 能够有效发挥中国的长处。 [13:24]

[网友银山拍天浪]:李克强总理访问罗马尼亚期间,中罗签署了核电、火电、风电等能源大项目合作协议,“中国装备”成为本次出访的一个核心关键词。请问您对中国与中东欧各国方在这些领域的合作前景有哪些预期? [13:26]

[陈新]:中国装备应该说是这次李总理访问的一个亮点。在访问期间中国与塞尔维亚和匈牙利宣布三方建设匈塞铁路,同时罗马尼亚也表现出引进中国高铁技术的意愿。

这些基础设施的建设将为中国与中东欧的合作奠定坚实的基础。随着铁路建设的铺开,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将在铁路沿线设立相应的货运、生产、商贸等基地和集散中心。这些生产经营活动和基础设施建设相辅相成,共同把中国和中东欧合作落到实处。 [13:27]

[网友真理埋在后花园]:李总理用“一艘大船”来比喻中罗关系,以契合的发展战略为引领之“舵”,以深入的务实合作为驱动之“帆”,以牢固的传统友谊为稳定之“锚”。陈主任,您对此如何解读? [13:29]

[陈新]:李总理这一比喻形象地描绘了中罗之间的传统合作,和深厚友谊。我们希望通过来自中国的东风能够推动中罗合作的“大船”满帆远航。 [13:30]

[主持人]:请问您,中国企业在中东欧地区的投资现状是怎么样的?对于他们未来的前景,您能否进行一些预测? [13:38]

[陈新]:中东欧在中国与欧盟的经贸合作中,是一个相对薄弱的环节。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的贸易,只占到中国与欧盟贸易的十分之一,去年是达到500个亿,而且主要是中国出口。与此同时,在相互投资方面,欧盟对中国的投资高于中国对欧洲的投资,但中国在中东欧地区的投资高于中东欧对中国的投资。中国现在投资30多亿,中东欧对中国的投资才10多个亿。实际上在金融危机之前,已经有一些大型中国企业率先进入中东欧地区,例如海信等在匈牙利组装平板电视,并在欧洲销售,联想也在捷克投资。金融危机的冲击下,一些中国企业撤出了该地区,但是近几年中国企业通过并购等方式,重新加大了对这一地区的投资。例如,烟台万华对匈牙利化工企业的并购,被英国《金融时报》评为当年十大最佳投资之一。此外,柳工在波兰并购工程机械企业,襄阳轴承入住波兰轴承厂等,都是近年来比较大的并购和投资项目。华为和中兴基本上在中东欧地区都设立了代表处,并计划将欧洲的部分生产基地、仓储中心、研发中心,设立在该地区。此外,中国的金融机构也开始进入该地区,中国银行十年前率先在匈牙利开设分行,去年工商银行和中国银行也在波兰开设网点,此外罗马尼亚也准备迎接中资银行的到来。

由于中国企业对该地区的熟悉和认知程度不足,包括因为语言上带来的障碍,该地区的潜力

还远未被中国企业所挖掘。中东欧地区拥有训练有素的熟练的劳动力，一些国家的劳动力成本也较低。同时，这些国家在技术上也有深厚的历史积淀。因此，中国企业投资该地区不仅仅要考虑到劳动力、市场等因素，同时，也有可能技术上挖掘到“黄金”。[13:40]

[网友一壶铁观音]:李克强总理的六点倡议之一是促进贸易和投资便利化，并且表达了中方愿在连云港为各成员国提供物流、仓储服务，请问您认为这将对上合组织成员国贸易和投资领域的合作带来哪些利好？在上合组织框架下发展自由贸易将带来哪些变化？[13:42]

[陈玉荣]:李克强总理这一倡议，再次体现了注重务实高效合作的工作作风。该倡议对推动上合组织框架内的多边经济合作具有重要的建设性意义，该建议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可操作性。中方表达出的这一愿望将为成员国拓展贸易往来，提供更多的便利和实实在在的帮助。这是中方为加快实现上合组织框架内贸易和投资便利化作出的又一重大努力和贡献。在某种程度上，它实际开启了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贸易投资便利化的新阶段。

正如李总理所指出的，当前的全球贸易一体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都在加速发展，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国家更应迎头赶上。中国在连云港，为成员国提供物流、仓储服务，就是加速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具体尝试和迈出的重要步伐，对各成员国发展扩大同中国的贸易往来和相互间的经济合作，都是一个重大的利好消息。[13:43]

[网友谢不用]:《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布加勒斯特纲要》是此次总理出行所取得的重大成果之一。李克强总理提出的“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共同发展；中欧合作，相向而行”的三大原则，该如何理解？[13:48]

[陈新]:去年温家宝总理在第一届中国中东欧国家领导人会晤上，提出了12项举措，目的在于推动中国与该地区关系的发展。今年李总理与这些国家的领导人共同发布了《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布加勒斯特纲要》，实际上是中国与中东欧合作举措的深化和延伸，具体体现为“3+6”的合作构想。

中国与该地区合作体现三个原则，即相互尊重、互利共赢，与中欧合作相向而行。相互尊重指的是，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相互尊重各自在转轨进程中的道路选择，而不同的政治制度不会成为双方合作的阻碍。

互利共赢更多地体现重视各自的关注，并充分发挥互补优势，通过合作带来1+16大于17的效果。

与中欧合作相向而行，更多指的是中国把与该地区的合作作为中欧关系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通过合作推动该地区的经济发展添砖加瓦。这与中国坚定的支持欧洲一体化这一立场

并不相矛盾，反而是促进。

中东欧国家在转轨之前对原苏东市场的贸易依赖度高达90%以上，在转轨过程中这一些国家对欧盟的贸易依赖度也接近80%以上。在私有化过程中，中东欧国家的产业基本上被来自欧美的企业所购买，民族产业已所剩无几。中东欧国家的金融业也在金融自由化的过程中，被西欧资本所吞噬。一些国家外资在金融业的比重甚至超过了90%以上，所以无论是从贸易、产业和金融的角度，中东欧国家对欧盟的依赖度不言而喻。

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西欧资本撤离中东欧，给中东欧的金融和经济带来振荡。后来出台了《维也纳倡议》，限制了金融资本从中东欧地区的大规模出逃，尽管如此中东欧地区在资金上依然存在缺口。中国通过加强与该地区的合作，促进该地区的发展，应该是互利共赢的好事。习总书记号召我们要自信，中东欧国家对欧盟的依赖度如此之高，欧盟为什么对中国与中东欧合作表现得如此的不自信呢？所以这一次把中欧合作相向而行作为中国与该地区的三原则之一提出来，希望欧盟能够重新重拾自信。[13:52]

[主持人]:请您再说说这六大合作领域，好吗？[13:56]

[陈新]:正如前面所说这六大合作领域实际上是去年12点举措的深化和延续。我们说中国与中东欧合作有三大支柱，一是政策对话，二是经贸合作，三是人文交流。这六大领域实际上是这三大支柱的具体体现，在政策合作方面，我们不仅举办中国与该地区领导人的定期会晤，同时还推动这一些国家与中国的各个省进行地方层面的交流和互动，进一步拓展政策对话的空间，和为做实合作寻找新的机遇。

在经贸合作方面，李总理提出来五年之内贸易额翻一番，也就是说现在500亿美元，五年之后要达到1000亿美元，那么根据《中欧合作2020战略规划》，到2020年中国与欧盟的贸易额争取达到1万亿。在这个背景下，中国与中东欧贸易翻番，应该不是一个很难的事情。

今年中国已经向该地区派出了100多个经贸代表团，寻找各种合作机遇。此外，中国还计划在这些国家建立一些工业园区，推动中国企业走进该地区。

金融合作也是双方经贸合作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中国愿意向该地区提供100亿贷款，推动中国与该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和能源合作。此外，中国还发起中国与中东欧投资基金，首期筹资5亿美元已获得了有关国家的积极参与，预计第二期筹资即将启动。这一些融资渠道将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

人文交流已经成为双边关系发展中不可或缺的机制之一，加强人文交流可以有助于深化双方人民的相互理解，人文交流不仅仅体现在互派留学生，文化交流，还有一个重要的领域是旅

游业的开拓。

中东欧地区拥有丰富的旅游资源。这一地区不仅拥有许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发的文化遗址，而且还拥有许多美丽的自然风景，温泉疗养，休闲度假等旅游方式，还远未被中国游客所挖掘。相信随着更多中国游客走进该地区，了解该地区，不仅有助于推动中国与该地区合作的发展，而且也会带动更多的中国企业走进该地区。[14:04]

[网友喜天]:前不久举行的比什凯克峰会上，习近平主席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合作模式，此次会议李克强总理再次倡议这一模式的尽快落实，您对此作何解读？上合组织为何如此重视交通领域的合作？[14:06]

[陈玉荣]:当前上合组织成员国都处于重要的经济发展阶段，即实现经济结构转型和经济崛起的重要时刻，因此各国对上合组织充满着期待，特别是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后，正是因为有了上合组织这个平台，使得一些中亚成员国经济避免了大幅度的下滑。在新的形势下，携手合作、加快彼此之间的经济往来、深化经济合作，成为各国的共识。

在这个背景下，中国领导人提出了构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战略构想，目的在于通过经济带的建设加快欧亚地区国家经济的发展和往来，使古丝绸之路焕发出新的生机。经济带既为沿线国家提供了共享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机遇，也为沿线国家共享欧洲的繁荣创造了新的契机。经济带的建设将给相关国家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李总理在总理会议期间，再次强调要加快成员国之间的互联互通，并呼吁尽快签署《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间国际道路运输便利化协定》，并表示中方将在促进道路畅通方面提供技术、设备以及融资等方面的支持。如果说把上合组织成员国之间的经济合作比作一辆汽车的话，那么交通领域的合作就是这辆车子的两个轮子，两个轮子跑起来经济才会有进展、才会有成就，这是一个前提条件，所以加快交通领域的合作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14:12]

[网友南北不知东西]:在会议开始之前，各界就对本次会议在金融领域的合作进展持有高度的期待。现在看来，是否达到了预期？李克强总理关于“加强金融合作”的倡议将对中国进一步提升区域自身影响力将起到怎样的作用？您对筹建“中国-欧亚经济合作基金”一事有何评价？[14:13]

[陈玉荣]:如果说交通领域的合作是两个轮子的话，那么金融合作就是经济合作这辆车子的发动机。所以，李总理在这个会议上特别强调了加强金融合作的重要意义。我们知道在2003年上海合作组织就通过了《上合组织多边经贸合作纲要》，这个《纲要》把交通、能源、通信、农业等领域的合作作为优先合作的领域，并确定了120多个大型合作项目。而这些项目

的落实推进非常缓慢，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资金瓶颈问题。因此，多年来一直在探讨上合组织框架内搭建上合组织开发银行这一平台。各成员国对此也进行深入的探讨和研究，在开发银行未能启动之前为了更好的落实上述大型经济合作项目，加快成员国之间的经济往来，李总理这次提出了，中国将设立中国—欧亚合作基金这一倡议，该基金面向上合组织成员国、观察员国和对话伙伴国，相信这一基金的启动将极大地促进上合组织国家之间在各个领域的务实合作，也将为上合组织多边经济合作带来新的面貌。[14:17]

[网友棋子的尊严]:您怎么看待中东欧各国在中欧关系中扮演的角色? [14:22]

[陈新]:应该讲从十八届三中全会闭幕以来，中欧关系进入了一个密集的互动期，首先是在北京举行了第16届中国与欧盟领导人会晤，随后李总理访问罗马尼亚，并举行第二与中国语中东欧国家领导人会晤，与此同时中法在北京举行了财经高级对话，英国首相卡梅伦今天也到访中国。这一系列密集的互访，凸显欧洲在中国对外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

同时这一系列的互访也验证了中国确实把与中东欧合作看作是中欧关系的有机组成部分。

[14:23]

[主持人]:刚才您提到了中东欧地区的旅游资源非常丰富，我本人也对中东欧国家很感兴趣，我能不能代表网友们向您提一个问题，您去过的中东欧国家里面哪个地方给您留下的印象最为深刻，您可以为网友们推荐一些旅游目的地吗? [14:25]

[陈新]:我早在1987年就到匈牙利留学，那时候就开始利用假期访问这片美丽的大好河山，那里不仅有金色的布拉格，素有“东方巴黎”美称的布达佩斯，和以居里夫人和哥白尼引以为豪的华沙。那里还有很多留待中国游客去探险的地方，比如位于罗马尼亚的德拉古拉城堡，因主人是吸血鬼公爵而著名。而捷克东部的奥洛穆茨小镇，拥有原汁原味的摩拉维亚风情，更为重要的是参观这个小镇是不收门票的。

欢迎大家有机会到东欧观光旅游。 [14:26]

[网友雨后有惊喜]:给我的感觉是，上合组织每次的重要议题都离不开区域安全合作这一领域，这次也不例外。这是为什么？在上合组织成员国加强安全合作方面，将有哪些前景可期？

[14:28]

[陈玉荣]:这是因为安全合作是上合组织的首要职能。上海合作组织的宗旨是维护中亚地区安全、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因此，安全合作和经济合作历来都是上合组织峰会和总理会议的两项重要议题。安全和经济是相辅相成的关系。正如李总理在讲话中所指出的，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没有安全，就没有发展。因此，安全合作是上合组织的首要任务，目的在于为经

济合作创造一个安全环境。

一段时期以来，上合组织所在的中亚地区安全形势趋于严峻和复杂。在中东、北非地区政治动荡持续，2014年美国 and 北约盟军大规模从阿富汗撤军，以及阿富汗明年春天大选的背景下，中亚地区三股势力再度反弹，宗教极端势力、恐怖分子制造的各种恐怖事件明显增多。在这种情况下，上合组织成员国当前的迫切任务就是加强力度打击各种恐怖主义活动，维护区域安全，为各国经济发展创造稳定的安全环境。在阿富汗问题上，一方面我们坚持在联合国的主导下解决阿富汗问题，实现阿人治阿，实现阿富汗的持久和平。

我们注意到，李总理的讲话中呼吁，各方应把打击恐怖活动和禁毒作为当前安全合作的重点，同时应尽快赋予上合组织地区反恐怖机构禁毒职能。[14:35]

[网友贾胜国]:上个月28日，北京天安门地区发生暴力恐怖袭击事件。经查明，这起事件的实施者与活跃在中国新疆境内的恐怖主义势力有直接的联系。您对于进一步加强上合组织成员国之间共同打击恐怖主义的合作有何建言？[14:36]

[陈玉荣]:上面我们谈到一段时期来中亚地区的恐怖事件明显增多，国际恐怖分子活动极为猖獗。今年10月28日在天安门发生的恐怖袭击事件就是东伊运分子制造的又一起威胁区域安全环境的典型事例。在这种形势下，上合组织成员国在加强安全领域的合作，特别是加大力度打击恐怖活动具有迫切性。

我认为上合国家应该在信息沟通、情报交流、网络安全等方面加强合作，共同打击危害地区安全的各种犯罪活动，共同营建安全环境，服务于各国经济建设。[14:37]

[网友意外遇到文件尾]:针对西方舆论所指的上合组织的实质是“东方北约”，您如何评价？外媒称，上合组织急需新盟友的加入来扩大影响力，您是否同意？应如何看待上合组织的扩员问题？[14:38]

[陈玉荣]:上面我们已经谈到，上海合作组织的宗旨是维护中亚地区安全，促进区域经济发展。

上合组织并不是军事政治集团，而是寻求共同安全，共同发展的新型的区域性国际组织，它的诞生和发展顺应了时代和平与发展的潮流。上合组织以对话促安全，以合作谋发展，不同于军事结盟性质的北约。

随着上海合作组织的发展，上合组织国际影响力不断的提升，越来越多的国家希望加入上合组织。上合组织进一步扩大，无疑将加强上合组织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和影响。同其他相关国际组织一样，上合组织的扩员也要遵循一定的原则。首先要求加入上合组织的国家必须承

诺接受《上合组织宪章》所规定的各项义务和条件，同时也要无条件地接受和认可其他相关条约和规定。

其次是上合组织扩员应该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也就是说上合组织的扩员，应该有利于上合组织的稳定和健康发展，而不是相反。[14:45]

[网友假装去钓鱼了]:近年来,在上合组织框架下,人文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取得了哪些进展?“扩大人文交流”为何会成为李克强总理的六点倡议之一?“实施共同计划和项目以充分发挥本地区旅游潜力”将给各成员国旅游业的发展带来哪些积极影响? [14:48]

[陈玉荣]:上合组织成立12年来,在安全合作、经济合作不断深入进行的同时,人文领域的合作也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上合组织成员国之间在教育、文化、旅游等领域的合作,都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成果。比如说上海合作组织大学的建立,将有力地带动了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在教育、科技研发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

此次李克强总理在上合组织总理会议期间,再次提出了加强上合组织成员国之间人文领域合作的具体倡议。特别是提到中方决定在北京建立上海合作组织中心,未来五年中国将为成员国2000名中小学生举办夏令营。相信这些措施的落实,将极大地增进上合组织成员国广大民众之间的友谊、相知和认同。[14:50]

[陈玉荣]:感谢各位网友的关注,再见。[14:51]

[陈新]:各位网友期待下次再见。[14:51]

[学术活动]

第二届清华—格罗宁根学术研讨会“中欧关系中的误解”成功举办

【希腊】Vasilis Trigkas

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硕士研究生

On the 26th of October 2013 the annual symposium of the Tsinghua-Groningen Research Cooperation on China-EU Relations took place at the Unisplendour International Center in Tsinghua's University Science Park. The Symposium attracted leading Chinese and European academics and diplomats as well as young researcher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the EU can no longer be a niche academic topic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studied by an academic minority. The two sides of the Eurasian landmass account for more than 1/3 of global GDP, 1/4 of global population and close to half of global trade flows. Yet the 10-year-long comprehensive strategic partnership between the two behemoths has experienced a prolonged phase of inertia, mainly because of misunderstandings about political values and the long-term strategic calculations in Brussels and Beijing. The Tsinghua-Groningen Symposium invited distinguished academics, think-tank experts and diplomats to share their insights on how China and the EU could neutralize the misunderstandings and promote a stronger

partnership shaping a multipolar world.

Prof. **Shi Zhiqin**, director of th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of Tsinghua University called the Tsinghua-Groningen symposium an extraordinary agora, attracting the cream of European and Chinese experts on Sino-EU relations. The symposium sets the foundations for a constructive track-2 dialogue, which aims to resolve the misunderstandings and help boost the Sino-EU relationship to a new level of unprecedented, institutionalized partnership. He urged speakers to engage in a warm dialogue and consider the implications for world harmony and peace of a strong and committed EU-China couple. The Sino-EU marriage that Romano Prodi described in 2003 may have not yet taken place, however it is within the preferences of both sides Shi argued. China and Europe are two of the world's oldest civilizations and their philosophical models have greatly shaped the identity of the world. This endows the two partners with a strong responsibility to safeguard peace and harmony in a multipolar and diverse world.

Professor **Jan van der Harst** from the University of Groningen summed up the workshop and made the closing statement. He pointed out that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Tsinghua University and the University of Groningen is unusually rich in that it includes teaching, research initiatives and a workshop series. It has indeed provided a wonderful and highly constructive platform for academic exchanges between leading Chinese and European scholars. Professor van der Harst expressed his confidence that such venues promote the study and development of China-EU relations and help policy makers address their misperceptions. The Sino-EU partnership is too big to fail he insisted.

The core argument of the symposium was that both the EU and China support a multipolar world yet their strategies in pursuing such an end differ, for they reflect diverse historical experiences. China's diplomatic imperative is based on the idea of absolute sovereignty. Accordingly, a state must not impose its political, social and religious views on other states. This is sometimes at odd with EU's universal institutionalism as expressed in the preeminent role of individual human rights.

Chinese need to study more European history and Europeans more Chinese history and thus break away from a Eurocentric or Sinocentric cosmotheory. Building a deeper understanding about the values of each civilization is a first-order condition for resolving value misperceptions and overcoming misunderstanding. At the same time diplomats in China and Europe need to promote technocratic solutions to trade and commercial disputes. These two combined will maximize China-EU strategic trust and boost the relationship to new grounds.

As Heraclitus once mentioned, “change is the only constant” in human affairs. This is also reflected in China’s yinyang (阴阳) . The world is indeed changing at an accelerating pace. The great divergence of history in the 18th century is now closing sharply. In this new world a responsible, fully institutionalized and comprehensive strategic Sino-EU partnership accepting cultural pluralism may well become the safest guarantor to harmony and peace.

The success of the 2012 and the 2013 Sino-EU conferences raises the stakes of the Tsinghua-Groningen partnership. Both sides look forward to the continuation and the upgrade of this flourishing cooperation and hope to engage in more academic exchanges, conferences and joint publications.

Speakers: *Cui Hongjiang, Enrico Fardella, Frank Gaenssmantel, Manuel Garcia, Huan Qingzhi, Tian Dewen, Zhang Lihua, Zhao Chen*

Findings and Discussion

- **Mutualizing Common Interests and Resolving Technical Disputes**

Prof. **Huan Qingzhi** reviewed the recent history of the Sino-EU partnership and argued that the time is ripe for the two sides to shape a more comprehensive & fully **institutionalized partnership** not limited to commerce and economics but also extended to other fields, like

security, space cooperation and culture. Yet EU-China diplomats need to make sure that each side can understand the key common interests of the other and thus develop an institutionalized China-EU mechanism to protect and enhance these interests.

Dr. **Frank Gaenssmantel** supported that whether and how disputes between the EU and China can be solved may depend on the perceptions of policy makers about the nature of the issue at stake. When it is perceived to be primarily technical, then negotiators will look for a solution based on technocratic rules. When the issue appears political then diplomats will engage in bargaining based on carrots and sticks. In addition it is crucial to examine the intangible meaning attached to the issue at stake, i.e. the degree and importance of symbolic connotations: Weak symbolic connotations facilitate rational negotiating behavior while strong symbolic connotations make it more difficult to give up the original position. Case studies from China-EU relations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human rights dialogue, market economy status, and cooperation on climate change) seem to suggest that **similar issue perceptions facilitate agreement**. Strong symbolic meaning may indeed impede agreement. So in a way one could say, that issues are what diplomats make of them. On these grounds the perspective for a full partnership and cooperation agreement look pessimistic. On the other hand a bilateral investment agreement is within reach.

- **Civilizational Values' Misperceptions shape Misunderstanding**

Prof. **Tian Dewen** argued that misperceptions on cultural values of China and Europe nurture misunderstanding. This is evident in the way China and Europe have applied force in international affairs. For the Chinese power is only a means to an end. The ideal is harmony. This is reflected through a concrete support to hierarchy and social identity. “Let the king be a king, the minister a minister, the father a father, the son a son” Confucius proclaimed. Social stability and ideal harmony are the pillars of the Chinese political identity.

On the other hand, the foreign policy of the West as expressed through **universalism** is based on power. In that sense, morality is a disguise promoting national interests. Christian universalism promoted crusades, free trade universalism led to opium war; value universalism shaped the way to neo-interventionism and New Imperialism. Ideological hegemony and neo interventionism lead

to the Iraq War in 2003, which was built on falsified evidence on WMD and on the pseudo-call for democratization. Some European countries support neo-imperialism others are more cautious.

China and Europe need to abandon the neo-imperialistic era. In doing so they must build **strategic mutual trust**. The EU must understand that the growth of China is conducive to stability, world peace and prosperity. The Chinese dream called for the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yet it made no call for a Chinese hegemony or Chinese universal values. China has consistently promoted a multipolar world and sees a united EU a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partners in such a system.

Prof. **Zhang Lihua** argued that the cultural values of China and the EU are more aligned than widespread beliefs of political science orthodoxy would suggest. China is the founder of the Eastern civilization while Europe is the founder of the West. Chinese values are still evident in the new security concept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lso many of Europe's **classical values** are reflected in modern EU's diplomacy. In many cases Chinese and European values converge.

For instance, both China and the EU are against horizontal and vertical nuclear proliferation. They promote arms control and aim to develop a multi-polar world. The EU supports the rule of law, democratization and personal freedom. China has also emphasized democracy, rule of law, patriotism, socialism, and inclusion. On a macro-level China and the EU support the same values. Yet on a micro-level China and Europe pursue a different set of policies.

The democracy promoted by the EU is based on a multiparty parliament of the English tradition. The democracy promoted by China since 1982 is based on socialism. Power belongs to the people and not the holders of capital. It is the people's congress system. China has a different concept of democracy and representation. The rule of law in the EU means that the law is superior to anyon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also attested the predominance of the rule of law since 1996. Indeed the law is superior to party decisions. The constitution is superior to any political decision and thus in this realm Chinese and EU values converge. After all the two sides have a flourishing judicial cooperation agreement.

- **Bridging the Value Misunderstanding: Accepting the Uniqueness of Civilizations and promoting a diverse world.**

Prof. **Cui Hongjiang** noticed that misunderstanding will decline once the EU asks non-western civilizations to contribute in today's evolving world based on their unique historical, political and philosophical experience on human rights and political representation.

In the past, Europeans had used their own **civilizational experience** to form a system of governance, define human rights, and form laws etc. They tried consistently to export it violently to Africa, South America and Asia. Today, the EU has begun to realize that trying to universalize a single system of thinking in a multipolar world is self-defeating. The China-EU partnership with moments of affection and moments of coldness is still the most promising relationship in deconstructing the old anachronistic system and reconstructing it based on a universal experience that accepts the diversity of cultures and the pluralism of political traditions. As Europe is becoming more diverse accepting other civilizations the EU-China relationship will become stronger.

Dr. **Enrico Fardell** noticed that in Sino-Italian and in China-EU relations it is essential to distinguish between **misunderstanding** and **misperception**. Misunderstanding as a failure to understand something correctly that leads to disagreement can be seen in this context – namely in the analysis of a bilateral relation – as incapability to achieve a convergence between common interests. Misperception on the other side should be seen as incapability to correctly estimate the other side's intentions. Misperception can thus lead to misunderstanding but it can simply impede contact and prolong a stalemate.

In the case of Sino-Italian relations, it seems that there were no 'real' misunderstandings in the bilateral relationship: they were 'fake' misunderstanding, or to put it better, constraints imposed by the bipolar structure of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and the Cold War logic that inspired it. Misperception however remains to this day as the major factor for potential stalemate and/or 'real' misunderstanding between the differences in institutional morphology of the two countries. The

potential for misperception was only partially reduced after the establishment of diplomatic relations in November 1970: the above-mentioned ‘peculiarities’ of Italian democracy and Chinese political system are in fact still at play today.

Dr. **Zhao Chen** argued that both the EU and China support a multipolar world, yet they tend to pursue different strategies in achieving such an end based on their civilizational values. The global governance model that the EU is looking to promote is institutionalism based on the preeminence of individual human rights. The EU’s political system has very strong “**supranationality**”. It is a *sui generis* project based on levering sovereignty from the nation-states to a supranational authority, like the European Commission in Brussels. Europe has shaped a post-modern world with a post-modern thought. It is in a sense the continuity of Emmanuel Kant’s democratic peace theory.

Chinese global governance is **egalitarian and sovereign**. For Chinese statesmen, equality and respect is the central idea. Developed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 should have a key footing in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and Europe should view both as equal partners. The Chinese egalitarian goal of a multipolar world has been shaped by a practical and a historical imperative. China as a developing country is looking to change the imbalance i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imposed at a time of Western hegemony and military coercion. In addition China has experienced the calamities of western aggression. Chinese has been invaded and brutalized since the opium war era. The EU should take these Chinese historical experiences in consideration in its engagement with China.

Dr. Manuel Garcia argued that global history has evolved from a **Eurocentric** to a **Sinocentric** approach. The School of California gives further details on the Eurocentric, or more precisely Anglocentric, view of global history. This has primarily regarded Great Britain and its colonies as the pivotal axis of analysis for the study of global movements, exchanges, meetings and encounters between Europe and the East. John Brewer has criticised this as an historiographic ‘error’ and stated that global history should not be conceptualized through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Great Britain and its colonies. Craig Clunas refers to the essential meaning of the

term ‘global’, which does not uniquely mean the history of the great powers of Europe and its colonies.

For the case of Sinocentrism we should stress two facts: Firstly, the acceptance of such Eurocentric mistake by western scholars during the last decade has shifted the accent towards an ‘exclusiveness’ of the East, mainly the Chinese world and its characteristics, by comparing the different path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China and Europe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Secondly, this shift and the exclusive focus on China and its particularities has led in some cases to an ‘abuse’ of the ‘great divergence’ debate, namely when Chinese scholars who define themselves as practitioners of global history, are in fact writing a new history of China and the experience of Chinese communities in the rest of the world. A practical advice for China is to invite more European scholars and internationalize its universities. The biggest Chinese universities have only a 1% ration of foreign to Chinese staff.